

◎ 傅元海 著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质量问题研究

A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F832.6
F972

湖南商学院

项建设经费资助

-69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质量问题研究

A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傅元海 著

F832.6
F972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 / 傅元海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58 - 8755 - 8

I. 中… II. 傅… III. 外商投资: 直接投资 - 研究 -
中国 IV. 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8637 号

责任编辑: 张 频

责任校对: 王肖楠 杨 海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董永亭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

傅元海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5.5 印张 300000 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8755 - 8 定价: 27.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外资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成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为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全新的视野。1999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概括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东道国资本的重要来源；通过技术转移可以推动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同时，有利于东道国提高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就业，促进环境保护等。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发展模式的转变，这就要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模式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如何实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模式的转变，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客观正确地评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科学地评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状况，这既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同时也是我国制定新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傅元海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就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问题与我进行过多次探讨，最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以其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专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他先后于 2006 年和 2007 年获得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利用 FDI 质量问题的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息不对称对我国利用 FDI 质量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项目立项，2007 年 11 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答辩。之后，他根据博士学位论文评议人及答辩委员们所提出的建议，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修改，最后形成了这本专著。

值此著作出版之际，我欣然为其作序。我认为，这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理论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关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也有一些理论研究，一些文献虽然提出了评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指标，但基本上仅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的某些方面，没有系统全面地涵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福利影响，尤其是没能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潜在影响和实际影响进行区分，而且一些评价指标难以用数据度量，缺乏应用价值。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一书则另辟蹊径，从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带来的潜在收益和实际收益的角度，明确界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质量两个概念，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详细地介绍了这些评价指标的度量方法，使这些评价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评价指标如不同来源、不同规模大小、不同利用方式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用事实说明了观点，增强了运用这些指标评价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说服力。

第二，研究方法科学，使该书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我国理论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系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一书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从引进和利用两个层面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整体状况进行了评价，得出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质量总体上均不高的结论，证实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的结论；同时，该书还从两个层面上比较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空间差异，得出了东中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因评价指标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结论。因此，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理论界关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的不足。

第三，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政策结论和建议。《中国外商直

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一书从数理模型的角度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进行了评价。该书通过建立优惠政策影响引进 FDI 质量的数理模型,揭示了优惠政策降低了引进 FDI 质量的机理。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系统地讨论了 FDI 质量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对 FDI 的欢迎态度、市场化、对外资进口的管制和增加技能型人才与 FDI 质量正相关;环境控制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与引进 FDI 质量反相关,而且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对 FDI 质量的影响在回归中也是不一致的,这与我国引进 FDI 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的利用 FDI 的类型或特点有关,也可能与 FDI 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有关,还与模型中度量 FDI 质量的指标反映的 FDI 质量维度有关。这些研究结论富有新意,颇有见地,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

该书的出版只是作者研究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的开始,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我借写序之际,希望傅元海博士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

方齐云

2009 年 9 月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2)
第二章 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	(14)
第一节 利用 FDI 质量的内涵与外延	(14)
第二节 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指标	(14)
第三节 不同类型 FDI 质量的分析	(23)
第三章 引进 FDI 的质量状况	(39)
第一节 FDI 企业规模和大中型企业情况	(39)
第二节 FDI 的结构特点	(42)
第三节 FDI 项目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含量	(50)
第四节 FDI 质量的其他方面	(55)
第四章 FDI 的利用质量——基于统计指标的分析	(58)
第一节 FDI 的资本贡献	(58)
第二节 FDI 的经济发展效应	(58)
第三节 FDI 对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影响	(63)
第四节 FDI 的人力资源开发效应	(70)
第五节 FDI 的对外开放效应	(75)
第六节 FDI 的经济结构效应	(77)
第七节 FDI 的税收效应	(89)

第五章 FDI 的利用质量——基于计量分析方法	(92)
第一节 FDI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92)
第二节 FDI 的溢出效应	(102)
第三节 FDI 企业出口的外部性	(107)
第四节 FDI 的产业结构效应	(120)
第五节 FDI 对 R&D 水平的影响	(127)
第六节 FDI 对经济多元化的间接影响	
——基于 FDI 对民营经济发展影响的视角	(130)
第六章 利用 FDI 质量的空间差异	(134)
第一节 引进 FDI 质量的空间差异	(135)
第二节 FDI 利用质量的空间差异	
——基于统计指标的分析	(149)
第三节 FDI 利用质量的空间差异	
——基于计量分析方法	(171)
第七章 FDI 质量的影响因素	(183)
第一节 优惠政策影响 FDI 质量的机理及统计检验	(183)
第二节 FDI 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93)
第八章 改善利用 FDI 质量的途径与对策	(217)
第一节 提高利用 FDI 质量的主要途径	(217)
第二节 提高利用 FDI 质量的对策	(223)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8)

第一章 绪 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直接投资（也称外商直接投资或外国直接投资，简称为 FDI）已成为影响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FDI 不仅是发达国家重要的资本来源，也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资本来源。纳鲁拉和邓宁（Narula and Dunning, 2000）强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 FDI 对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或产业聚集的发展虽不总是起决定作用，也不是唯一选择，但却是最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短缺资本的同时，也低成本地获得了稀缺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等资源。FDI 的这些潜在收益对东道国是重要的，特别是对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尤为重要。1999 年《世界投资报告》从多方面概括了 FDI 对东道国的影响：资本的重要来源、通过技术转移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带动贸易增长、提高出口竞争力、扩大就业、促进环境保护等。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政府将吸引 FDI 作为政府工作重点，期望通过引进 FDI 获得更多的资本、新技术、市场营销技巧和管理知识。但杰沃希克（Javorcik, 2004a）认为许多国家引进 FDI 的实际技术含量低于预期。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吸引 FDI，到 90 年代后期吸引 FDI 的数量名列世界前茅，近年来与美国、印度一直是世界上 FDI 流入的三大热点区域，2006 年实际利用 FDI 达 694.7 亿美元，FDI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今外资经济已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利用 FDI 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 FDI 的目的是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弥补国内投资不足；第二阶段是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市场换技术”是利用 FDI 的重要目的，但现实与此相背离^①，即出让了市场，FDI 的技术水平却低于预期目标，最突出的问题是吸引 FDI 的数量虽然很多，利用 FDI 的质量却不高，中国引资的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我国在利用 FDI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从引进的 FDI 看，合约 FDI 数量多

^① 彭有轩：《利用外资：“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与现实的背离》，载于《计划与市场》2002 年第 9 期，第 4~5 页。

而实际到位率低,假外资不少,项目平均规模不大,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结构分布不合理,技术含量不高,研发(R&D)投资少等;从FDI的利用绩效看,FDI的技术、管理和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外资对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质量提升的贡献小,FDI的区域分布不合理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外资企业出口转内销,税收贡献小,合资和合作企业高估外方技术、设备的价值,低估中方资产以及通过转移价格损害中方利益,并存在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效应等。为转变利用FDI的模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这实际上是要求利用FDI模式加速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因为改善利用FDI的质量不仅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能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等。但是就如何评价利用FDI质量,国内外的研究很少,直到现在还没有公认的利用外资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因此在中国成为引进FDI大国和中国引资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之际,研究我国利用FDI质量问题对如何改善利用FDI的质量以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引进FDI和FDI的利用绩效两个方面确立评价我国利用FDI质量的指标,期望基于这一指标体系运用一般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多角度地考察我国引进FDI的质量和FDI的利用质量,对我国利用FDI质量的时间变化和现状及其区域的差异做出初步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利用FDI质量的现状与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利用FDI质量的途径与对策。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国内外关于FDI对东道国影响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母国或母公司与东道国两个视角研究FDI。从投资者角度研究FDI,主要探讨跨国投资的动机和优势;从东道国视角的FDI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出口、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FDI的这些影响实际就是东道国利用FDI质量的某一方面内容。

1. 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FDI对增长的贡献包含了FDI的净资本效应和外部性,二者分别通过直接和

间接作用影响经济增长。随时间推移,资本短缺程度缓解时,引进 FDI 通过资本效应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让位于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等。多数学者认为 FDI 对东道国经济有积极的贡献:阿西汉 (Asheghian, 2004) 对美国的实证分析、萨吉 (Saggi, 2002) 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江小涓等 (2002) 和罗长远 (2005) 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 FDI 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

另一些学者如艾特肯和哈里森 (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认为 FDI 促进经济增长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FD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二者的关系是模糊、不确定的。布罗姆斯特罗姆等 (Blomstrom et al., 1994a)、科塔里狄 (Kottaridi, 2005) 发现二者是正相关的;而本德—纳本德等 (Bende-Nabende et al., 2003) 则发现二者的关系是反相关的。金等 (Kim et al., 2003) 发现,FDI 流入带来的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2. FDI 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学者对 FDI 的技术转移或溢出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文献肯定了 FDI 的技术转移、溢出效应 (Blomstrom and Kokko, 1998; 王红领等, 2006; 袁诚、陆挺, 2005); 另一些人如贝尔和马林 (Bell and Marin, 2004; Marin and Bell, 2006) 对 FDI 的技术转移、正溢出效应提出了理论质疑和实证证据。

一些学者认为 FDI 的溢出效应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一些学者如勒米 (Lemi, 2004) 发现,FDI 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容易产生溢出效应,而发展中东道国的情况则是复杂的。埃尔玛瓦兹尼等 (Elmawazini et al., 2005) 指出已有的理论研究文献和实证研究表明,FDI 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并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FDI 在发达国家存在正溢出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假定:即 FDI 企业技术水平高于本地企业,否则正溢出效应可能就不会产生,甚至产生负溢出效应,如布洛尼根和斯洛特 (Blonigen and Slaughter, 2001)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美国在 1977 ~ 1994 年引进 FDI 的增加与技术进步为零相关甚至负相关。

3. FDI 的市场信息溢出与贸易效应

从理论上说,不论是占领市场类型的 FDI 还是出口导向类型的 FDI,对东道国出口都有积极作用。哈里森 (1994) 的实证分析发现,FDI 的市场信息溢出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出口。希尔和阿图科拉拉 (Hill and Athukorala, 1998) 指出,不同来源和产业类型的 FDI 影响了 FDI 企业的出口。

实证研究的结论印证了理论。哈里森指出, MNCs 推动象牙海岸、墨西哥、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的出口, 帮助本地企业打入了国际市场。利普赛 (Lipsey, 1995) 的实证分析发现, 美国子公司对一些国家 (母公司也出口的国家) 出口比对相类似特征的其他国家出口更多, 在两类高新技术产业上影响尤其突出。闵 (Min, 2003) 分析表明, 马来西亚 1988 ~ 1995 年间的 FDI 促使生产和出口的模式从初始产业形式向可出口的制造业变化, FDI 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在世界市场上出口的份额从 1985 年的 0.6% 迅速提高到 1995 年的 1.6%, 特别是电动和电子产品成为最重要的出口部门; 与最重要的 FDI 来源国日本的双边贸易 (出口) 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亚洲金融危机后, 美国成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 FDI 来源地, 美国 FDI 的市场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

4. FDI 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FDI 一般流入东道国效率较高的区域和部门, 这会加剧区域和部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维萨克和罗拉斯 (Vissak and Roolath, 2005) 对在爱沙尼亚的研究发现, FDI 导致了区域和部门的不均衡发展; 孙和柴 (Sun and Chai, 1998)、牛南浩 (1998)、藤田和胡 (Fujita and Hu, 2001) 分析发现, FDI 的区域不平衡扩大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 加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栋吉斯和维纳斯 (Donges and Wieners, 1994) 指出, FDI 的进入在东欧私有化过程中有助于解决企业的垄断; 牛南浩指出, FDI 在中国某些行业和地区形成垄断, 抢占了市场; 江小涓、吴定玉 (2006) 实证发现, FDI 促进了中国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

一般研究认为, 引进 FDI 不仅推动经济增长, 而且提升产业结构, 如威廉姆森和胡 (Williamson and Hu, 1994), 认为 FDI 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代化生产部门或扩大了现代化生产部门, 改善了整个经济结构。布罗姆斯特罗姆 (1986) 对 FDI 与墨西哥 1970 ~ 1975 年制造业结构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二者正相关, 外资支配的企业比其他接近于经营得最好企业的效率更高; 外资企业进入现代部门可以提高结构效率, 而传统部门仍然不变, 这样, 外资进入会强化欠发达东道国生产的二元结构。阿尔托蒙德和雷斯密尼 (Altomonte and Resmini, 2001) 分析表明, 来自西欧的 FDI 优化了波兰的产业结构。巴里奥斯等 (Barrios et al., 2005) 指出, FDI 产生的市场外部性推动了本地产业的发展, 来自爱尔兰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结论。FDI 对微观经济结构可能有积极作用, 如吴 (Wu, 2000) 指出引进 FDI 还有利于产业聚集、推动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代谦、别朝霞 (2006) 的理论研究说明发达国家的 FDI 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选择取决于

东道国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当东道国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弱时,FDI 转移的是落后、淘汰或技术水平不高的产业,这妨碍了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江小涓等一些学者认为,FDI 流入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了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等。

5. FDI 活动的本地化程度

米尔扎、吉鲁(2004)、宋(Sung, 2000)指出,出口导向型的 FDI 由于价格转移和缺乏关联,生产本地化水平低。后向关联中采购是度量 FDI 生产本地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刘民权等(2001)分析了不同来源的 FDI 在广东后向关联效应中采购比重的不同,欧资企业最高,其次是日资企业,再其次是海外华资企业,最后是美资企业。李新家(2005)的《跨国公司在华筹供策略》是目前最为系统地研究中国这一问题的文献。这一成果表明:随 FDI 特别是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外资企业在中国采购的比重不断上升,采购的规模不断扩大,FDI 企业日益注重在中国本地化经营,跨国公司在华筹供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6. FDI 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

引进外资对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产生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维萨克和罗拉斯概括了 FDI 对小国爱沙尼亚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破坏了经济稳定发展,导致经济结构雷同,产生了社会和经济两极分化,FDI 通过进口增长加速通货膨胀,引起政治、社会和文化冲突,外商投资者可能干预东道国制定政策。一般认为,MNCs 因为子公司比东道国本地公司采用更先进的环境技术和管理方法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技术改善的重要源泉,艾斯科兰德和哈里森(Eskeland and Harrison, 1997)、哈里森实证研究发现,FDI 企业比本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和使用更清洁的能源。但恰德诺夫斯基和洛佩兹(Chudnovsky and Lopez, 2003)认为,MNCs 子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依赖于子公司经营的质量和子公司投资的东道国特征;卢卡斯(Lucas, 1992)等研究发现,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转移,提高了最穷国制造业的有毒物排放强度的增长率;霍尔(Hall, 2002)指出,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 FDI 出口污染是国家策略,日本政府资助“肮脏”产业转移到国外。侯伟丽(2005)研究 FDI 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结论表明,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 FDI 企业的环境污染程度比港澳台的 FDI 低。

7. FDI 对东道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

人力资源开发包含劳动力的就业和人力资源的素质即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米尔扎和吉鲁等实证研究表明, FDI 促进东道国就业, 其中独资企业对就业的贡献更高。戴维 (David, 2003) 对英国的研究发现, FDI 对就业的影响因 FDI 的进入方式、国别和子公司类型而不同, 如绿地项目的 FDI 创造就业, 而兼并或收购的 FDI 会减少就业, 在东道国实现价值增值更多的子公司也增加了就业。木下 (1999) 对中国的实证发现, 合资企业没有提高本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独资企业不愿培训中国员工, 而是从母国进口中间投入品。江小涓等指出, FDI 对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贡献: 培养了研究开发和高级管理人才, 在 FDI 企业内培训了本地职员, 为本地企业员工培训提供了支持。李铁立认为港澳台投资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员工的劳动技能, 但欧美日 FDI 没有显著提高劳动技能。

上述大量的研究虽然不是直接研究 FDI 的质量, 但实质上是从 FDI 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如 F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贸易、人力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 这对于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标准确立和实证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标准研究

虽然没有文献提出 FDI 质量的科学评价体系, 但关于 FDI 对东道国的影响或者东道国从 FDI 获得净收益的研究很多, 这些文献已经涉及 FDI 质量评价的一些重要内容。这类研究普遍认为 FDI 对东道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德梅格 (1997)、希尔和阿图科拉拉强调, FDI 不仅扩大了东道国出口, 提高了东道国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能力, 而且为引资方带来了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如资本、R&D、知识、技术和组织经验等一揽子资源; 方齐云 (2002) 则分析了 FDI 对东道国的正负效应, 正效应包括产出、出口、国际贸易收支、就业、资本, 负效应包括垄断、经济波动、技术和高级人力资本流失、转移定价、资源浪费、环境损害、项目“飞地化”加剧经济二元化, 他强调 FDI 的影响受 FDI 的规模、要素密集型、期限和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家势力类型的制约。但这些文献很少将 FDI 对东道国的多种影响或东道国从 FDI 获得的种种收益上升到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标准。

1. 国外的研究

较为系统地提出了 FDI 质量评价指标的是库玛 (2002), 他指出不同 FDI 项

目对东道国发展变化的影响依赖于 FDI 带来新知识和在经济中扩散的范围、FDI 为东道国制造的商品提供国外新市场的机会、对东道国技术能力构建的贡献等。基于东道国利用 FDI 获得的收益角度, FDI 质量能从子公司对东道国产生的正外部性产出或销售质量中得到理解, 具体指标包括子公司产出的本地化程度、对现代产业发展的贡献、出口导向的范围和子公司的 R&D 活动。他进一步提出了 FDI 质量指标的具体测度方法: 子公司产出的本地化程度可定义为子公司销售额中价值增值的比例, 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 在东道国创造的就业机会、技术知识转移和扩散与本地化程度正相关。对技术密集度或现代产业发展贡献的测度, MNC 的投资是进入传统产业或相对成熟产业替代潜在的本地企业, 还是发展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 同时又是东道国新兴产业, 这是很重要的; 显然, 后者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以及 MNCs 雇佣的本地员工的干中学为东道国企业带来新技术和以知识扩散的形式产生外部性, 这样 MNCs 能迅速推动东道国技术的升级。出口导向程度的测度, 将子公司对母国的出口与对第三国的出口独立计算, 虽然两类出口都没有为东道国出口带来多少外汇, 但二者产生的外部性是不同的: 前者对于东道国企业向 FDI 企业“学会出口”的潜力有限, 而后者要求子公司为特定的区域或世界市场进行特定的生产, 使 MNCs 采用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经济, 东道国企业有更好地了解特定产品的出口和可能市场的潜力的机会, 根据这些信息的溢出, 面向第三国的出口对东道国更有价值。子公司的 R&D 活动是创新活动, 具有相当大的潜在正外部性, 子公司经营对 R&D 支出的强度是衡量 FDI 质量的一个指标。后来库玛 (2005) 进一步阐述了东道国从 FDI 获得的收益: 组织技巧和技术都是东道国期望获得的关键资源, 净资本形成效应也是衡量 FDI 质量的指标。因此, 投资的质量可以依据在东道国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判断。

库玛对 FDI 质量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正如斯里瓦斯塔瓦 (Srivastava, 2003) 在书评中指出: “这本书是现有的唯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评价 FDI 质量做出贡献的文献”^①, 评价 FDI 质量的指标很大程度上抓住了 FDI 可能影响东道国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而且指标都可以用具体的数据衡量, 易于进行实证研究, 但库玛的 FDI 质量评价标准侧重于对引进 FDI 的利用质量评价, 忽略了引进 FDI 本身的质量, 对东道国引进外资时对不同质量的 FDI 识别没有多大帮助, 仅适合对外资利用的绩效进行评价。而且这些指标并不能概括 FDI 对东道国

^① Sadhana Srivastava. 2003. “Global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20 (2): 194.

的主要影响,对不同东道国引进 FDI 的目标和意义也可能不同,甚至没有包含对一些东道国引资目标十分重要的指标,如 FDI 的环境成本、人力资本开发及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国家所需要的企业组织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等。库玛也强调“不同国家引进 FDI 的质量因不同的标准而普遍不同”^①。

2. 国内研究

对中国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很少,但有些学者主张从一个或几个角度来衡量或评价利用 FDI 的质量,余德蓉等(1997)、张宏(2004)从 FDI 的项目规模、技术含量、产业和区域分布以及 FDI 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影响评价了利用 FDI 的质量;张建勤(2000)还补充了 FDI 对国内企业的冲击和对 FDI 的吸收、消化的评价标准;何洁也提出了 FDI 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标准;巴克莱等(2004)主要从 FDI 的项目规模、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关联评价利用 FDI 的质量。这些文献多是从理论上就 FDI 影响的某些角度来提出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指标,没有形成系统的指标评价体系,大部分甚至没有抓住利用 FDI 质量评价的核心,如 FDI 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对 GDP 和贸易的贡献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等没有作为 FDI 质量评价的内容。

张琦(2003)概括了利用外资质量评价的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强调外资能促进中国资源配置的优化,能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具体标准包括产业发展、区域发展、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品牌、产品的市场结构、利税和发展后劲等(甘宏业,1996);二是强调经济安全,利用外资质量的具体内容是民族经济主体论、交换论和防范危机论。张琦则强调利用 FDI 质量是确立标准和实施标准的过程,评价利用外资质量的标准体系包括外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能否满足出口、就业等 9 大目标,外资对 9 大目标具体细化的经济指标的影响和 FDI 项目、投资方式、经营管理方式等四个层面;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利用外资中质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利用外资质量标准不全面、不统一、不完善,已有的利用外资质量政策和标准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没有确立利用外资质量的监管体系。

近年来有两个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利用 FDI 质量的评价体系的文献值得注意,一是北京市社科“九五”规划课题——建立北京市利用外资质量评价体系的构想课题组(2001)根据 OECD 提出的评价 FDI 对东道国社会经济贡献作用的标

^① Kumar, N.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9.

准,结合北京市城市性质和资源特点,并参考国家科学技术部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评价方案,构建了北京利用外资质量评价体系,并赋予了具体指标不同的权重:节约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指标 30%,其中包括节能、节约水资源、环境质量系数、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认证企业比例、污水处理,每个指标权重占 5%~8%;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指标占 30%,包括就业、外资流入总量、外资结构、外资产业投向、债务率(外债依存度),各占 6%;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指标占 40%,包括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比重、销售(营业)收入占全市比重、盈利能力、涉外税收占全市工商税收比重、对扩大出口的贡献、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每个指标权重占 6%~8%。并提出修正指标,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是动态的,可根据北京市产业政策和利用外资工作的实际情况适时加以调整。同时给出了具体计算的公式。

类似地,陈自芳(2005)基于 FDI 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利用 FDI 质量评价标准,包括 FDI 对东道国经济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大类,每一类有 7 个标准,并赋予每个具体标准不同的权重。FDI 的直接作用占 48%:权重最高的是 FDI 的产业特点与国内产业的互补性占 13%,其次技术含量、税收贡献和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每个指标权重占 7%~8%,再其次是出口水平、占用国内紧缺资源的程度、就业贡献,权重等于或低于 5%,这些指标涉及 FDI 对东道国经济直接影响的重要方面,衡量了 FDI 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升、国际贸易贡献、人力资源开发、竞争力的提高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FDI 对经济的间接作用占 52%:权重最高的是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各为 15%,其次是管理知识的溢出 7%,其余是 FDI 企业品牌产品的关联效应、FDI 对东道国参与国际化产生的影响、出口关联效应、人力资本的提升,权重为 3%或 4%,这些指标包含了 FDI 对东道国经济隐性影响的重要方面,如衡量了 FDI 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溢出效应,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以及对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影响。

两个评价标准体系无论在具体指标上还是评价方法上实质上是相似的,是目前国内评价 FDI 质量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既包括了 FDI 的正面效应,也包括了负面效应,涵盖了 FDI 影响我国的一些重要方面;但二者也有不同,北京社科成果因结合北京利用外资的目的,二级指标中赋予环境的权重较高,而对于技术、知识、产业结构等作用不突出,这个指标对于北京利用外资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具有普遍意义。陈自芳的则相反,突出了技术、知识的溢出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对于北京社科成果更具有普遍意义,抓住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两个评价指标体系也忽略了一些重要方面如 FDI 的空间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市场化进程、对国内资本存量效率和 R&D 等方